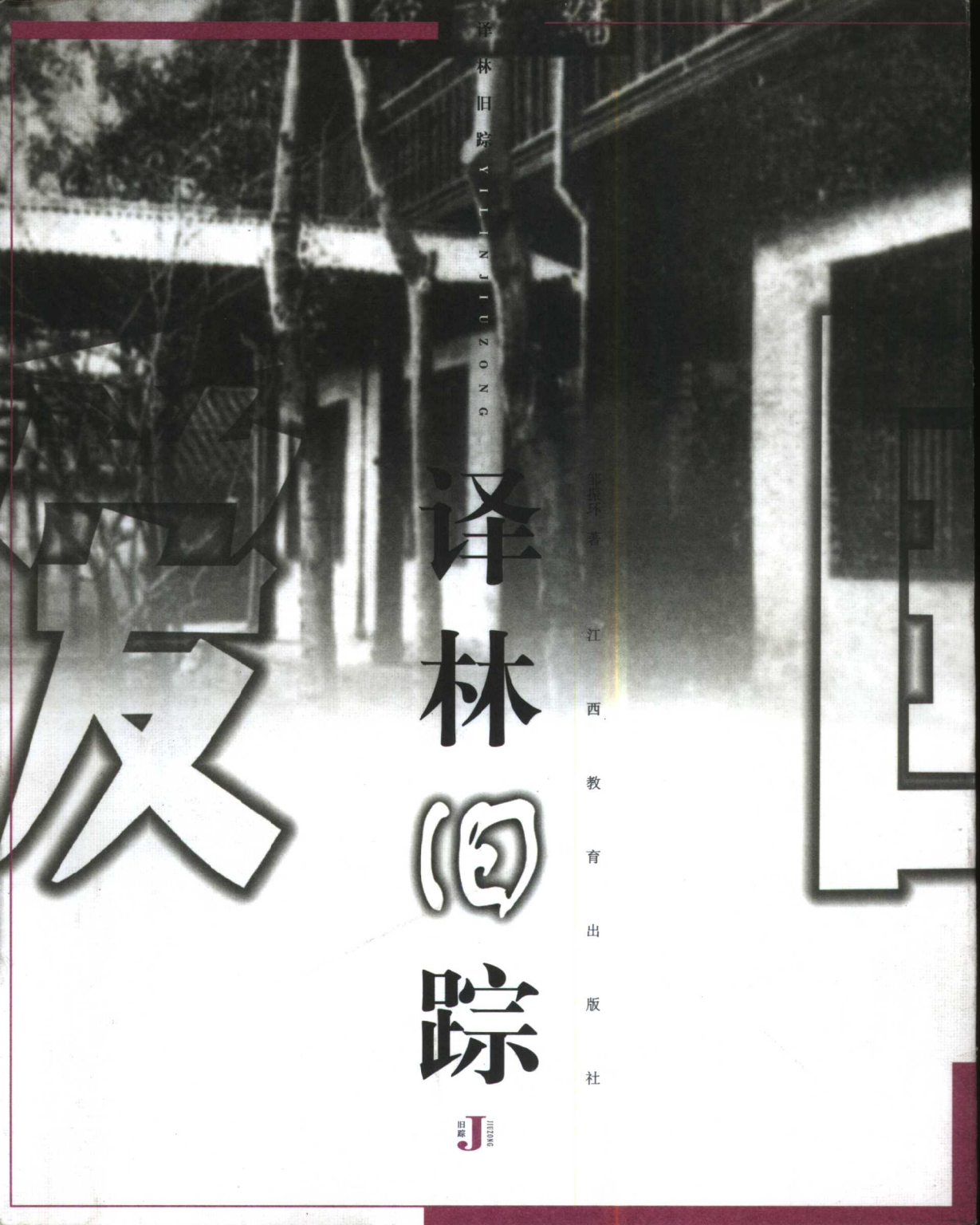




译林旧踪
YILIN JIU ZONG

译林旧踪

译林
JILIN

邹世环 著

江

西

教

育

出

版

社

译林 (2) 踪

J

邹振环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林旧踪/邹振环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6
(旧踪丛书)

ISBN 7-5392-3501-2

I. 译... II. 邹... III. 翻译-历史-中国
IV. H05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778 号

译林旧踪

邹振环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URL:<http://www.jxeph.com>

E-mail: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80 毫米×1230 毫米 24 开本 9 印张

字数 200 千 印数 1-2600 册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2-3501-2/G·3332 定价:15.7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西学翻译与文化传统——代序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传统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是人们解决既有各种问题的有效的文化途径。换言之,传统是过去时代的思想、规范仍然通过各种形式保留在今天社会生活中的活的东西。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什么?至今莫衷一是,我认为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优秀传统一直为学者所忽视的,即中国人通过翻译寻求域外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化传统。

中国有两千多年漫长的翻译史,《周礼》和《礼记》两书中就有关于周王朝翻译活动的记录。中国留下的翻译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其大致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三大部分,按时间序列,恰恰是中国翻译史的三个阶段。民族翻译留下的文字记录相对比较少,而佛典翻译文献和西学翻译文献的数量则相当可观。西学翻译是指晚明由耶稣会士开始译述的汉文西书以来所形成的文献,据中外学者的统计,至20世纪40年代末,约有译本近5万种,堪称一片广密的译林。

中国漫长的翻译活动,曾经对于促进人们的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变革,对于社会文化的更新与进步,有过巨大的作用。一部中国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文化传播史。文化传播往往不是算术相加所能得到的结果,它会激发起人们对更多知识和信息的追求和无穷的创造力。自从有文字传播以来,特别是东汉以来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翻译在文化传播

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初的1919年,朱自清就在《新中国》杂志上指出:“翻印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本国来的第一件利器。”翻译出版构成了近百余年文化史最重要的一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等伟大的革命家;从康有为到梁漱溟等出色的思想家;从梁启超到鲁迅等杰出的文学家;从李善兰到夏元瑛等重要的科技传播家者,都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百余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是一部千辛万苦寻求独立和富强的历史,也是中国人通过翻译向西方探寻真理而不懈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这就是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最大、最强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一。

季羨林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所作的序言中,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条长河,“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用大矣哉!”西学翻译所引入的西来活水渗透到了近百余年间文化的各个领域,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工业革命”,已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西方新思想的传播,导致了近代学术的转型;影响至深的当是文学领域,从文学角度来说,19世纪末以来有影响的大作家无不受益于外国文学,翻译小说导致了文学结构的变迁,西方小说的输入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没有20世纪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积极译介和借鉴,中国文学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在《谈诗人译诗》一文中写道:“翻译刷新了文学语言,而这就从内部核心影响了文化。”西学翻译不仅带来了新观念,还引入了许多新词汇,如冰淇淋(Ice-cream)、咖啡(Coffee)、雪茄(Cigar)、沙发(Sofa)、茄克(Jacket)、摩托(Motor)、沙拉(Salad)、模特儿(Model)、摩登(Modern)、荷尔蒙(Hormone)、维他命(Vitamin)、引擎(Engine)等,以及“维纳斯”、“丘比特”、“宙斯”等神话人物至今读来已不觉生硬,似乎已经融入中国文字语汇之中了。外来新词汇、新术语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促进了文化交流,增加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还为读者今后的阅读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期待视野,这也是西学翻译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一个最好的说明。

代代相传的翻译传统给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纵横错杂的译林中留下了大大小小各种奇葩异木,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关于晚清以来百余年间西学翻译译林中的译家、译作、译业的“故事”。明末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代译家启开了三百多年来西学翻译的源头,而晚清西学翻译更与当今的翻译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希尔斯所说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因此,已经步入新世纪的中国读者,不是有足够的理由通过这些译林旧踪,来重温近百余年来的西学翻译传统吗?

目 录

西学翻译与文化传统——代序(1)	傅兰雅的“中国情结” (45)
《几何原本》全译与中国“西学翻译之父” (1)	“谈天”“说地” (49)
马礼逊与《圣经》的汉译 (5)	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 (52)
帮助林则徐翻译西书的伯驾 (9)	沈毓桂与培根的《新工具》 (55)
墨海书馆与近代西学翻译史之最 (12)	艾约瑟及其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 (58)
慕维廉与《地理全志》 (17)	华盛顿全传的第一个中译本 (62)
合信及其编译的医书五种 (22)	益智书会与最早汉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心灵学》 (65)
嘉约翰与博济医院的医学译书 (26)	最早在译文中写下“马克思”的蔡尔康 (68)
美华书馆及其出版的《造洋饭书》 (29)	任廷旭与《文学兴国策》 (71)
京师同文馆及其译书 (32)	“令人乏味”的“残余”和“宗旨甚高”的“外史学” (75)
丁韪良及其译述的《万国公法》 (36)	广学会与《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78)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清末科技的引进 (40)	“译才并世数严、林” (82)

南洋公学译书院	(87)	刘伯明与杜威演讲的翻译	(147)
孙中山惟一的一部译作	(92)	罗素与赵元任	(150)
广智书局的译著	(95)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著作的译刊	(154)
金粟斋的故事	(99)	《小说月报》的改革和文学研究会的译书	(157)
杨荫杭与《名学》	(102)	创造社与泰东图书馆的翻译出版活动	(160)
薛福成与《续瀛环志略》的编译	(105)	张竞生的美的书店和《忏悔录》	(165)
《法国革命战史》与“战史丛书”	(109)	鲁迅与“左联”的翻译群体	(169)
会文学社与《普通百科全书》的译刊	(112)	《爱的教育》的生命力	(174)
地学译家张相文	(116)	《资本论》:中国翻译漫长的接力赛	(178)
孙毓修及其编译的《地理读本》	(119)	译本最多的著名战争小说《西线无战事》	(183)
辜鸿铭译经与译诗	(122)	西风社与“西风丛书”	(186)
周桂笙与译书交通公会	(125)	《西行漫记》与西方记者的报告文学译作	(190)
商务印书馆版“林译小说”的魅力	(128)	朱生豪与莎剧翻译的艰巨工程	(195)
译坛“圣手”伍光建	(13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早与影响最大的译本	(199)
穆藕初与泰罗《科学管理原理》最早的中译本	(135)	傅雷与《约翰·克利斯朵夫》	(202)
《新青年》的“易卜生号”与《娜拉》的译刊	(139)	跋	(205)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43)		

《几何原本》全译与 中国“西学翻译之父”

《几何原本》全译与
中国“西学翻译之父”



徐光启

要寻找中国西学翻译的源头,我们就自然会想到 400 年前的一位智者,他的名字叫徐光启。

徐光启(1563—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人。18岁成了秀才,34岁时中举,以顺天府第一名而“名噪南北”。但次年会试落第,回到上海继续他教书和读书的生活,就在科举的途中,他在耶稣会传教士的住宅见到了意大利神甫郭居静(Cattaneo, Lazare, 1560—1640),“与郭子语,颇愜洽”。在郭居静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1600年春,徐光启赴京应试,道经南

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hieu Ricci, 1552—1610),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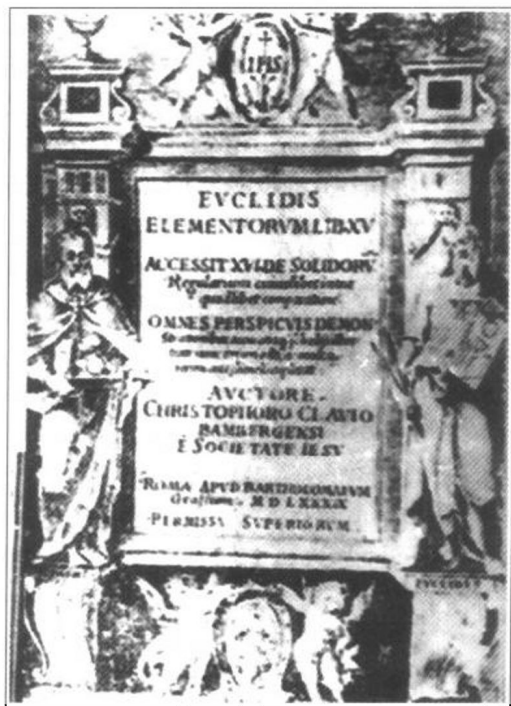
人晤谈甚欢,徐光启对利玛窦的评价是“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

1603年,43岁的徐光启再度来南京访利玛窦,利玛窦已经进京,在南京主持教务的罗如望(Jannes de Rocha, 1566—1623)接待了他。罗如望循循善诱地为他讲论教理,并把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书送给他。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称其读后非常佩服,“于邸中读之达旦不寐,立志受教”。连日在教堂里“观教礼,考道义”,听罗如望讲“十诫”的道理。1603年1月15日由罗如望施洗入教,教名“保禄”。1604年徐光启赴京会试,考中进士第88名,同年7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进翰林院修习,三年学习期满,1607年被任为翰林院检讨。在此期间他与留居北京的利玛窦经常在一起探讨天主教教义,并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每布衣徒步,晤于(利玛窦)邸舍,讲究精密。承问冲虚。”翌年,徐光启向利玛窦建议,“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则是要新奇而有证明。”(《利玛窦中国札记》)他们挑选合作译出的第一本重要的科学著作就是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原著共13卷,第1卷由5个公理出发,讨论各种几何形的基本性质和毕达哥拉斯定理(相当于中国的商高定理)等;第2卷讨论形与量间的一些基本关系,用几何图形表示几何恒等式;第3、4卷是有关圆与切线、圆内接正十五边形作图;第5卷比例;第6卷相似原理;第7卷论数的基本性质;第8卷论几何数列,指出质因数分解的唯一性;9卷论数的基本性质;第10卷涉及无理数的讨论;第11、12、13卷专门讨论立体几何,并涉及Eudoxus的穷尽法。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拉丁文注释本共15卷,其中14卷是13卷的补遗,第15卷是新添入的公元三世纪后的内容。丁先生因为这一注释本而被誉为“16世纪的欧几里得”。该书每卷有界说、公论、议题。界说相当于定义,公论相当于公理。每题又有法、解、论、系,法指题用,解述题意,论则是发明其所以然之理。

几何学在欧洲是一门古老的科学,而对于17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却是一种全新的知识。Geometry的Geo原义是多少,后缀metry是测量学的意思,徐光启用“几何”移译了Geometry,使这一古汉语词汇成为一个完美的音译和意译结合的新词。《几何原本》中有许多术语和名词,翻译为中文时是无

所依据的,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合作,开创了明清之际汉文西书译述最辉煌的典范。所译许多几何学用语,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至今仍在沿用。也许正是徐光启这些创造性的译词,200多年来,一直被中国译家所尊崇,《几何原本》前六卷译出后也被中国学者反复审订、辑注、校雠,直至240多年之后,即1852至1856年寓居上海的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Wylie, Alexander, 1815—1887)合作,在诞生于上海的中国第一家西书中译的机构——墨海书馆补译完后九卷。这部历经两个半世纪译全的科学名著,显示了中国译家一种海纳百川的心胸和巨大无比的创造力。



15 卷本《几何原本》原版首页

中国是一个算术发达的国家,《九章算术》代表了中国所具有的高度发展的计算技术,但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中国人只注重具体数并阻碍他们去考虑抽象的概念;中国人重视实践和经验的性格又使他们倾向于重视“数”而忽视“形”,导致中国数学史上没有出现公理化的数学理论结构,未形成一种严密的演绎体系。《九章算术》的论证方法是先举出例题,再论述一般的解法,采用归纳法。公理化的方法是演绎法,是科学理论系统化的有效的方法。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当理论知识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对大量的范畴、原理进行归纳,以构成理论化的系统。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按照演绎逻辑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系统。《几何原本》前六卷的译出,

为明清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的理论结构的典型模式,它对传统的中国的以“算”为中心的数学模式提出了学术挑战。

在明末清初西学引进的过程中,数学是中国学者作出较为有力的学术回应的一个领域。我们从阮元编的《畴人传》一书中可以发现,从明末的大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无不受到《几何原本》的影响,就在《几何原本》问世不久,中国出现过几个简本,如1608年孙元化的《几何体论》与《几何用法》。杜临甫将《几何原本》删削成《几何论约》。清代著名的数学家梅文鼎所著的《勾股举隅》、《几何摘要》、《几何通解》、《几何补编》、《几何类求》等,都是在数学的层面上对《几何原本》一书进行释解。有的数学家甚至尝试将《几何原本》的体系容入《九章算术》的体系,如李骞培就按《九章算术》的体例将《几何原本》的内容分成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梅文鼎也曾利用古代传统的勾股算术来证明《几何原本》的命题,该书题为《用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者对于汉文西书大多持一种疑虑的态度,但对《几何原本》则大加赞美,认为该书是“西学之弁冕”。

《几何原本》在中国译出的深刻意义当时徐光启已经认识到了,他认为此书的价值远非仅仅是一部数学教材,他认为演绎法的数学能使钻研理论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从实践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指出中国人无一人不当学,并且预言“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这一300多年前的预言竟是这样的富有远见卓识。这位先进的智者早在法国著名数学家笛卡尔之前便感受到了《几何原本》对于改变中世纪思维方式的必要。他在主持《崇祯历书》这一大规模西洋天文数学的成果时,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发人深省的文化命题:“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面对明末西洋学术的挑战,这是一种何等气魄的开放胸怀啊!

徐光启在译出被誉为“字字精金美玉”千古不朽的《几何原本》之后,还与西方传教士先后译出过有关陆地测量的《测量法义》、有关西方水利技术的《泰西水法》以及宗教伦理方面的《畴人十篇》、《七克》和《灵言蠡勺》等,无论是西学翻译的理论还是具体译述的实践方面,徐光启都是开山者和先驱者。我想,把中国“西学翻译之父”的桂冠授予徐光启,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马礼逊与《圣经》的汉译

马礼逊与《圣经》的汉译

明末清初西学翻译的主译者是在华的西方耶稣会士,清代中期经历了百余年禁教和翻译的潜流期之后,重新拉开西学翻译帷幕的是新教传教士,其中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马礼逊。

就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后的 1795 年,英国教会与长老会、公理会合作成立了伦敦传教会。1804 年,伦敦会物色到了一位 22 岁的青年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他后来成了派赴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出生在英国北部一个贫穷的家庭,有七个兄弟姐妹,他排行最



马礼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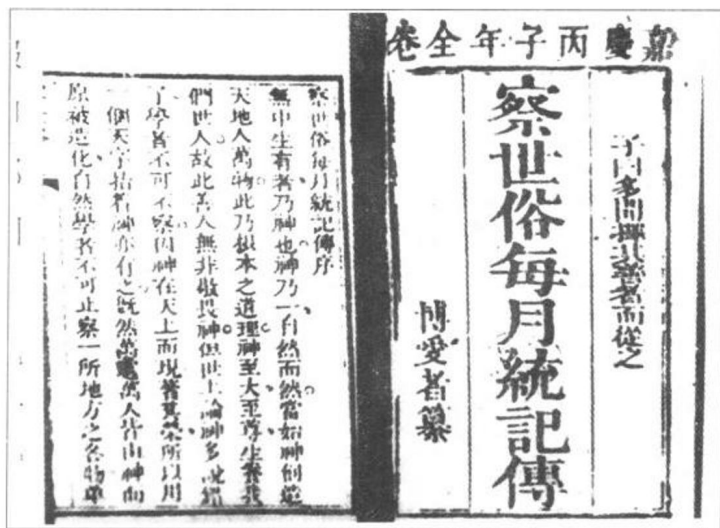
小,家境极为贫困。父亲制鞋坯为业,一家老小全都参加劳动,马礼逊从小

受到宗教的灌输,勤奋读书,先后学会了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他考入伦敦霍克斯顿神学校,后转入高斯坡神学院攻读神学课程,还学习天文、医学和初等汉语,并听取了英国传教士在非洲和印度等地传教经验的介绍。1807年1月8日,25岁的马礼逊自神学院毕业,随即派赴中国。

马礼逊离英国之前,伦敦会通过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巴克斯写了一封信,给澳门的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当年随使马戛尔尼赴华的托马斯·斯当东,要他帮助让东印度公司在马礼逊进行活动时不要干涉他。斯当东当即为他东印度公司内部进行了疏通。马礼逊随美国商人在澳门活动时,遇到了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摩顿的女儿玛丽,两人一见钟情,1809年2月20日举行了婚礼,从此东印度公司也消除了对马礼逊的冷遇。在结婚典礼上,公司负责人还当场宣布正式聘用马礼逊为公司翻译,年俸500英镑。从此马礼逊就以英商的身份公开活动。从1807年来华到1834年病逝于广州,期间除三年返英休假外,有25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没有能在中国建立传教会,私下洗礼的信徒只有5人,但他毕生所做的工作,不仅为新教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他为教会做的《圣经》的译述和《华英字典》的编纂工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写下了重要的一章。

据杨森富的《中华圣经翻译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介绍,唐代已有了《圣经》翻译活动,但由于印刷术尚未发达,因此这些《圣经》的节译文只在很小的圈子里流传。1294年到达元朝的法兰西斯会的僧侣孟高维诺(Montecorvino)曾在1305年1月8日给罗马教皇的一封信中,称自己已将《新约全书》中的诗篇译成了中文。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虽然没有完整地译出《圣经》,但在他们的汉文西书中同样不同程度地节译过《圣经》的内容章节片段,如罗明坚的《天主教教实录》、阳玛诺的《圣经直解》等。18世纪初,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巴设曾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译成中文,该稿本1739年为东印度公司的和治孙(Hodgson)在香港所得,以后捐给了大英博物馆。

新教传教士的《圣经》翻译是同时在印度和中国进行的。已刊最早的古汉语《圣经》译本是在印度的英国传教士马士曼在其助手、亚美尼亚人拉撒的帮助下完成的,1822年在印度出版。1807年伦敦会给即将来华的马礼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书影

的“指示”中称：“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可根据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个场合方便行事。……我们坚信你能住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一直等到你能达到学会汉语的

巨大目标。……你也许有幸地能翻译《圣经》。”马礼逊来华之前，曾在大英博物馆找到巴设的《圣经》译稿。从1808年开始，马礼逊殚精竭虑，历时五年之久，将《新约全书》译成中文，并在广州秘密雇佣了几个刻版工人，排印了两千部。从1814年起，马礼逊又与1813年伦敦会所派来华的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合作，花了五年的时间，将《旧约全书》译成中文。马礼逊和米怜在广州所经历的终日蛰居的日子，使他们对中国的官方直至民间的“天朝自大”(Ethnocentrism)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礼逊居于广州十三行的夷馆内，因靠江岸，地势低洼泥泞，常常会为水淹所困。洋行所雇庸仆，皆须为洋行所准，洋人既不能坐轿，又不得在江中划船运动。西妇不能在广州逗留，马礼逊个人在广州，深受与家庭分离的孤寂之苦。他说自己“孤独，完全处在陌生人当中，没有朋友却有许多敌人”。他在米怜的帮助下，1815年在南洋马六甲建立了一座印刷所和开办了培养到中国去当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的学校——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要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基督教，首先得让他们了解产生基督教的地方，要使他们懂得那里所产生的并不低于中国的文明。口头说说不解决问题，中国的方言太多，

只有利用中文出版物,因为中国的书面文字是统一的。1815年8月5日,马礼逊筹办、米怜负责编辑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英文名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马六甲正式创刊。这是近代第一份中文杂志,主要是宗教,其次才是世俗的内容。

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了这部《圣经》全译本,取名《神天圣书》,线装本,共21册,史称“马礼逊译本”。《圣经》得以完整地传入中国,马礼逊为第一人,这是世界《圣经》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马礼逊把汉语的文体分成“雅”、“俗”和“雅俗相间”三种,五经是雅的代表;小说是俗的代表;其间是雅俗相间的文体,他采用的显然就是后者。马礼逊去世后,他的儿子马儒翰向大英圣书公会写了一份报告,要求修订“马礼逊译本”。参加修订的除马儒翰外,还有麦都思、郭实猎和裨治文。1837年出版《新约全书》,1839年出版《旧约全书》,1840年又出版经郭实猎修订的《新约全书》,故此译本又称“郭实猎译本”。太平天国初期采用的《新约全书》就是郭实猎译本。这是《圣经》对中国政治发生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帮助林则徐翻译西书的伯驾

帮助林则徐翻译西书的伯驾

林则徐在广东组织过有相当影响的翻译活动,曾译出过著名的《四洲志》等,林则徐不懂外语,他的主要工作是组织选题、聘请译员和审订加工。在林则徐聘请的译员中,有在印度塞兰普尔一所教会学校念过 10 多年书、并参加过马什曼译述《圣经》活动的亚孟;有曾就学于槟榔屿罗马天主教办的学校、学习过拉丁语的四川人袁德辉;有早年留美,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康沃尔地方的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的学校里念过书的亚林,英文名为 William Botelho,有称林阿适;还有一位是著有《劝世良言》的梁发的儿子梁进德,他曾在“马礼逊教育会”主办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随裨治文学习过英文和希伯莱文。

林则徐主持的翻译班子中最早起用外国新教传教士参加翻译工作或审定译稿。如美国旗昌洋行商人亨特、美国传教士布朗、美国医生喜尔,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传教医师伯驾(Parker, Peter, 1804—1884)。1834 年伯驾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医学博士。同年就踏上了来华的旅程,1835 年他在广州开设了第一家有着 40 只病床的眼科医院,又称新豆栏医局,这也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西医医院。据卡德伯雷(W. W. Cadbury)等著的《在柳叶刀的刀刃上——博济医院百年史,1835—1935》(上海和香港,1935 年)记载,当时广州患眼疾的人数众多,医院开张后,头三个月就治疗了 900